

## 似水流年

## 毕业五十年琐忆

## 朝花夕拾

## 摘棉花

上世纪60年代,南京师范大学(以下简称南师)图书馆。

一天下午,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文学刊物《蜜蜂》,翻阅时,心中突然“咯噔”了一下,有些莫名其妙。几年后,我毕业分配到了石家庄。那一次感应,终于见了分晓。

《蜜蜂》,是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。我那次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是上苍的一种暗示。

河北,成为我人生的新起点。

## 一

我是从扬子江中的小岛扬中县,摇着小船前去镇江参加的高考,走进了南师。偌大的校园,满目古典宫殿式建筑群,小桥流水,古色古香,被誉为“东方最美丽的校园”。

回想中学时,我在煤油灯下读到著名作家刘绍棠的文学创作经历时,曾激动不已。置身在这么优雅、美好的校园环境里读书,可以视为梦想中的境界了。

中文系课程不多,也好应对。我定了个大学四年的苦读规划:大一,攻读诗歌;大二,散文;大三,小说;大四,戏剧。四年后我毕业时,古今中外的文学大观,已了然于胸。

我每天除上课外,辗转于校、系二级图书馆,如饥似渴地游弋在书海中。我不仅读书,还要创作。

践行规划,我首选诗歌。即使在洗衣服时,也不肯浪费时间,总是边洗边想。时间不长,晚上我开始失眠了。校医诊断为神经衰弱,给了安眠药。服用第一天管用,第二天后就失效了。我晚上不能入睡,白天脑子一片空白,不能思考,更不能读书,真是痛苦不堪。

医生无策,我就自我治疗。我到校图书馆找医药书,自己寻找疗法,结果找到的药方是:体育锻炼。

于是,我积极进行体育锻炼。早晨,跑步、练单双杠;下午,打球。几乎每周有好几个下午都泡在排球场上。

## 二

我和华祖荫一起分配到

石家庄铁路中学。开始时的印象,最深的当属打排球。

我俩本是南师校排球队的主力,这时又在一起,便共同帮助铁中组建了教工排球队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这里的排球运动尚不普及,能组建起排球队的学校、企事业单位为数不多。我们的球队曾在全市巡回比赛中屡屡获胜,只输给过河北师大体育系教工队。后来华祖荫调回南通,我也调离学校,从此,与排球分手。

在铁中教学之余,我坚持读书和写作。

教学任务并不重。那时,社会上正弥漫着“读书无用论”。这对我们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,纯属“奇谈怪论”。我们是吟诵着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的诗句成长的。读书怎能无用呢?读书就跟吃饭一样,不读书就像没有吃饭,精神上饥饿。

要说吃饭,这里真不能和江南比。刚来时,每天要吃从小没见过的玉米面窝窝头。粗粮粗做,还不讲究,吃饱就行。气候又很干燥。记得华祖荫刚来时,不适应这儿的气候,一直流鼻血。

后来方知,这其实并不影响人的才智。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,就出生在林冲发配的沧州。我想,他当时也肯定是啃着可能比现在还要差的窝窝头苦读成才的。大米和软语,可以孕育江南才子;玉米和高粱,同样能培植旷世奇才。生活可以慢慢地适应。

渐渐地,我习惯了面条、干燥、梆子腔的高亢和太行山的雄古气息。以后,置身于太行山的雄奇壮美中,反而会慨叹,来此乃人生之大幸也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

我坚持读书。仅读诗,就用了这样两种方式:每天早晨,到学校门前那块麦地里读诗、背诗;每次出校门,先默记一首古诗词,然后边走边背,归来时,事情办成了,默记的诗词也背熟了。

我坚持写作。在教学之余,我为学校创办了油印的文

学刊物《新芽》,团结并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。我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,后来主攻报告文学。那时,一些文学刊物被取缔了。作品发表的平台主要是报纸。要想学习写作,只能选新闻。在南师,我曾捡到一本新闻专业的杂志,名为《新闻业务》,并带到了石家庄。我就是翻着这本杂志,熟悉了有关新闻知识,写出了不少新闻作品,日后也是靠着这些新闻知识和写作的实践积累,调进了市政府机关。

## 三

“文革”结束,文学复苏。既有文学理论的底子,又有新闻写作的实践,自然而然地,我走上了报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这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已由政府机关调进了文艺部门,从事专业的文学编辑和创作。

说起报告文学,我只记得大学时的选修课上,老师曾经讲过《大庆之歌》和《大寨之路》,也只是有个印象。至于如何才能真正进入创作阶段,则不甚了了。

一切从头开始。

其时,文学刚刚复苏,报告文学又属新兴门类,不像诗歌、散文、戏剧,已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。而且,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多。我把当时可以找到的作品一一精读,解剖结构,透析行文,推敲语言,探究新闻视角和文学元素。

我匍匐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,砥砺前行。一面精读,一面创作。每篇都要着眼于技巧的磨砺,追求布局谋篇和语言的精美。取材的对象,从一个人到一群人,从一个事件到一条战线,从小村庄的发展到省会百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取材的范围囊括了工农兵学商和交通、教育、科技等各个行业。作品的篇幅也由小到大,先短篇再中篇,最后写出了5部长篇,有太行山的扶贫、电力系统的“状元工程”、狼牙山五壮士的传记和九江抗洪的史诗等。

发表园地从地方刊物到《人民文学》,有的直接印刷成

册。这些努力,使我获得过政府文艺创作奖,并加入了中国作协,为本地报告文学的兴起、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。

## 四

最后说到楹联书法。

历史上的文人都会做对子,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我当初学中文,就是想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。在教学和生活中,每有合适的机会和氛围时,我总会创作诗、联,应酬唱和,从不懈怠,为夕阳之年的楹联书法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我从小爱好书法,书法课上,曾接触到书法的基本常识。“文革”中抄写大字报,办大批判专栏,又为书法践行创造了机会。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参加工作起,我一直坚持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中用毛笔写稿、改稿。从事编辑工作时大量的来往信札,我皆坚持毛笔为之,从未间断。

从专事文学到专营书法,是在上世纪末。我应邀为一新开张的茶楼撰写商店开业联,并受邀做文化顾问,我的书法才进入实用阶段。

在书法实践中,还要讲究书写内容。于是,我又重新审视楹联。原来认为楹联是文学中的“小儿科”,其实,真正钻进去是有大学问的。

我写过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共12部书,还有50多年执毛笔为文的历练,支撑了我后来的楹联书法。

我因写作《赵朴初,佛教中国》客居北京7年,借此走访了国内若干城市的书画市场,了解信息,开阔视野,后返石家庄成立了书法工作室,至今近6年了。

生命的漂泊中,我终于可以停下来,保留一份传统文人似的淡泊心境。算快乐,也算养生吧。

毕业50年欢聚,我奉献了一副装裱好的、用隶书书写的楹联:俯仰重温鸿鹄梦 沉浮皆念萤雪情。

50年,弹指一挥间。我要倾诉的是:感恩长江!感恩南师!感恩太行!

余炳年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 我的获奖照片

1984年,我46岁那年,我们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工会举办了征文大赛。当时,我在公司下属的铜矿峪矿任办公室主任。我的参赛作品是一首歌颂劳动模范张凤阳的诗歌。本次大赛参赛作品近千件,由十余名评委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评出获奖作品。我的那篇诗歌获得唯一的一等奖。这次获奖,大大激发了我的文学创作热情。图为我在颁奖仪式上的留影,手中拿的是奖品——一本书和一支钢笔。

韩长锦/文并供图

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寄:石家庄市中山路313号燕赵老年报忆往昔版,邮编050011;或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)

## 儿子名字叫“新生”

每个人的名字都有一定的意义,而我儿子的名字“新生”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1976年7月28日凌晨,一阵蓝光闪过之后,唐山市发生了罕见的7.8级大地震。地震后,我和已有8个月身孕的妻子被压在废墟之中。被人扒出后,我的脸上、胳膊上、腿上多处受伤,妻子的小腿肚子上划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,血淋淋的。她挺着个大肚子,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那天,下着小雨,还不时地发生余震。房子、食物、水都没有

了,我们只好冒雨坐在空地上,心情不安地熬着时光。当时,饥饿和恐惧交织在一起,我们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。天渐渐地黑了下來,我们越发感到担惊受怕,心情沉重。突然,不知是谁喊了一声,灾民们便涌向了马路。我扶着妻子站起来一看:是解放军来了!我和妻子像看到了亲人一样,心情十分激动,也想冲到解放军身边,但因妻子行动不便,只好在原地站着。

不一会儿,十几名头戴五星、身穿绿军装的沈阳军区

某部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跟前。他们一边安慰我们,一边发放食品、药品。当得知我妻子腿上有伤,又是一个快临产的孕妇时,他们很快找来一位名叫王君的女军医,对我妻子进行专门护理,又帮助我们盖了简易棚。从那以后,王军医一天几次来看望我妻子,给她换药、检查身体,帮助洗洗涮涮、缝缝补补,还不时地送些好吃的,亲如姐妹。

震后一个多月一个下着雨的清晨,我妻子在王军医的专护下,在一个操场上的帐篷

里分娩了。当孩子的啼哭响起时,我和我的父母都激动得掉下了眼泪。是党的关怀,是亲人解放军的精心护理,我的儿子才能平安降生。为了感谢党、感谢亲人解放军,我们全家人当即商量好,给孩子起名叫“新生”。

42年过去了,每当和儿子说起那场劫难和亲人解放军给予的爱,总会使我们想起王君军医来,想起帮助我们重建家园的解放军,想起了许许多多。

李湘杰/文